

Z H E N G

Z H I

D E

R E N

政治的人

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

[德] 奥斯卡·内格特 (Oskar Negt) 著

郭力 译

Der politische Mensch
Demokratie als Lebensform

政治判断能力是如何产生的？一个令人敬重的政治的人，

一个人们对他的思想言行给予信赖的人，他的成长需要哪些重要过程？

人并非生来即是政治生物，因而进行政治教育是每一个和平社会存在的先决条件。

漓江出版社

政治的人

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

[德] 奥斯卡·内格特 (Oskar Negt) 著

郭力 译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漓江出版社

桂林

Der politische Mensch: Demokratie als Lebensform by Oskar Negt

Copyright © Steidl Verlag, Göttingen 2008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1-22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的人: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德)奥斯卡·内格特 著;郭力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5.11

书名原文: *Der politische Mensch: Demokratie als Lebensform*

ISBN 978-7-5407-7664-0

I. ①政… II. ①内… ②郭… III. ①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IV. ①D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9862 号

策 划:郑纳新

责任编辑:鸿 均

封面设计:李诗彤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28.25 字数:500 千字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6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译者序

记得二十年前我曾问过一位德国生物学博士,政治(Politik)是什么意思。他想了想说,是管理国家的艺术。他的回答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一来政治在我的大脑里,大概是关于指导思想、政策的执行贯彻、统治管理一类……铁血的感觉,从我的角度,绝然想不到艺术上去;二来他是生物学博士,却可以对此问题作出此等简练准确的回答,说明这种政治概念属于他们的基础教育范围,是一种普遍认知。

二十年后,当我用了近两年时间翻译了这部《政治的人: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上述感觉更得到了确认。并且以前的——不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认为西方人不关心政治的偏见,也有所改变。我很庆幸,通过译书能了解到,德国人所以有今日这样很强很清醒的政治意识,要感谢他们有许多激情满怀,富有判断力、责任感的社会学家,大众政治辅导员(如果允许我这样称呼的话),比如本书作者奥斯卡·内格特先生。

当人们赞赏德国二战后认真反思的认罪态度,对他们诚恳认错,对战争罪行表示悔悟,向各国道歉、向所有死难者致哀的行为表示敬重之时,恐怕很少有人想到,这些在公众舆论域发生的一切是怎样产生的。这一切不会理所当然地不请自来!正如内格特先生在本书中所述:“在德国,对历史的反思已成为一个集体成就,一个集体认知过程。”可想而知,位于这个集体中心的,就是像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这样的社会学家们,是他们如阿多诺一样提出了这样的警醒:要尽一切努力,让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悲剧不再重演。如今,他们仍活跃在大中小学、业大,各种政治培训、报告讨论会等公众域中,为保持民众普遍的政治觉悟进行着不懈努力。本书正可使读者对此类努力窥见一斑。

关于翻译

评论、评判、批评、批判这些汉语词汇,在德文中都可以是一个词:Kritik!

这是我在 Kritik 的家乡德国生活多年后,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求证、翻译的过程中的发现。特别是 2013 年笔者有幸翻译了《法兰克福学派史》(该书 2014 年

初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才有机会将 Kritik 通常的翻译“批判”改为“评判”。

本译著中还将沿用大部分上述译著中的改译,比如将“批判”改为“评判”,“启蒙”(Aufklärung)改为“解明”,“唯心主义”改为“理念主义”等(详见《法兰克福学派史》译者序)。

因本书作者内格特也是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本书中 Kritik 又属于最常出现的词汇,笔者还想对此话题作些说明。

Kritik 的意思,内格特先生这样对笔者解释道:“其希腊文是‘评定、评价的艺术’。它是要对事物及理论进行分析、考核、论证、研究。它可得出正面结论,也可提出批评、建议,尽管会具有考查、批评倾向,其目的却是为了人类社会的改进与完善。”

翻译过程也是学习过程;通过日复一日的艰辛翻译,通过同德国友人进行的广泛求教讨论,笔者对 Kritik(评判)的理解越来越清楚,并渐渐悟出一个“评判”的大体历程:康德最先举起“评判”大旗,1804 年康德去世,14 年后出生的马克思再次将它举起;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出生于马克思去世 12 年后的 1895 年,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重新发现马克思,将他的“评判”方法在自己学派中广泛推行;阿多诺等人接过这个旗帜后,哈贝马斯、内格特等后人,在学派创建八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在继续将它高举。

原来马克思高举的是评判,而非批判大旗!

令笔者庆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没有再举“批判”大旗,显然人们没有忘记这杆大旗曾造成了怎样深重的灾难,也不希望让“批判”再次搞乱人们的头脑。笔者真诚希望,评判(Kritik)能早日得到正名,作为 Kritik 的译文取代批判。

其间我在德国也同两位年轻大学生谈过“批判”与“启蒙”的翻译问题。两位都是留学德国的八零后女大学生,德语能力都很强。来自浙江的那位同学说:“是啊,Kritik 不是批判,我爷爷那时候就是受了批判的……Aufklärung 也不光是教育问题。”我想知道在台湾是怎样介绍启蒙运动的,我问:“什么是启蒙?”来自台湾的女同学告诉我:“启蒙就是……就是要独立思考,运用自己的理智……其实叫启蒙也是挺矛盾的。”八零后女大学生对这些哲学词汇的敏感令我感动感慨,本身又感到是对自己改动努力的鼓励。

本译著中笔者还将 Öffentlichkeit 一词译为“公众域”,没有采用“公共领域”及

译者曾经的“公共域”的译法。因这样的构词法相当于“公共电话”“公共场所”，但“公共域”令人无法想象。当我问德国友人，他们读到 Öffentlichkeit，会有哪些想象时，他们会说：可以是学校，是公众聚会、讨论，这个词的主体是公众。Öffentlichkeit 在德语中，包括公众性及公共性两个方面，在社会学方面涉及的主要是公众性，是关于关心公共体生活，为它议、为它争的公民、公众。例如本书作者对公众域有如下论述：

“……为公众域而战，表达的是人类——不论个人还是群体——真诚的独立解放的诉求，它是社会生活人性化的斗争焦点，是保卫群体自由团结的焦点。”

“公众域应有足够的规模及结构，它所能提供的应远超出市场商品交易的私人交流，而要让拥有公民权的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加入到政治化关联中。”

翻译的过程也是接受挑战的过程。本书作者学识渊博，善于谈古论今，引经据典，这为翻译工作带来很大难度。如果没有当今的计算机技术，要找寻许多文字的出处、背景资料，是难以想象的。但仅靠这些技术手段、词典书籍，要完成这本专著的翻译仍然困难重重。本书中给出的“译者注”有三百多个，这些译注如果不是通过计算机搜寻找到，便是通过同友人、专家的求教讨论得出。在此，译者要特别感谢对我的翻译工作始终给予大力支持的各位友人，他们是译者的先生 Richard Wilkinson、德国文理中学退休德语教师 Rolf Müller 先生、Kay Mestern 先生、Claus Czeranski 先生、Wolfgang Bammert 先生等。

孔子曰：“志于道。”即，以（人）道为目标立身。译为德文成了：Der Weg ist das Ziel——路即目标。阴差阳错，面目皆非，不过产生的新意却也不赖，更乐为人们所接受。在此，译者愿以“志于求索”与读者共勉。

郭力

2014年6月24日于德国弗莱堡

建立国家的问题，
即便是一个魔鬼民族
——纵然听之有欠尊重，
(只要他们有理解力)
总是可以解决的……

摘自《论永久和平，一个哲学构想，第一补充稿》，

伊曼努尔·康德著

和平是政治的唯一目的，
政治也是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
和平哲学之初是恐怖。

摘自《政治与和平》，多尔夫·斯泰恩贝格著，

1986年出版于法兰克福，第7页

这样的话，公正就是她的腰带，
忠诚就是她肚上的围带。
这样，狼可到羊群里做难民，
豹子可躺在羊羔旁；
小牛、幼狮、家畜会一起生活，
听凭孩子将它们逐赶。
母牛和母熊会一起吃草，一起产下幼崽，
雄狮会像牛一样食草。
婴儿会在龙纹蝰蛇洞里惬意玩耍，
孩子可把手伸到毒蛇嘴里打拍。

摘自《圣经·旧约·以赛亚书》11:5-9

前 言

人并非生来即是政治生物,因而进行政治教育是每一个和平社会存在的先决条件。

一个生气勃勃的民主社会,其体制的命运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要看民众对“共同生活会受损害”有怎样的担忧;其二,要看民众是否愿意对整个社会福祉承担政治责任,以及这个意愿的强烈程度如何。在此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民主是唯一一个需要学习的社会政治规范,而且需要天天学,时时学,不间断地学,活到老、学到老地学。

亚里士多德将人定义为政治生物^①,听上去好像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一个恒定状态,事实上这并不是指一个大自然发展过程的终极结果,而是一个教育、认知进程^②的方向和结果。将人定义为政治生物,本身也在将目标作为生活方式来定义;在此,生活方式应由具自主自治能力的自由公民来决定。只有神帝和动物不需要政治,可以生活在政治之外。在古希腊人的设想中,个体人(ιδιώτης)——他不是政治的人,没有文化——的个体生活与群体无关,他不参与任何国家事务,因而他位于社会最下层。希腊文中,与个体人一词相近的 ιδιώτεια 具有双重含义,既指个体生命,又指愚蠢。

伯里克利^③在他著名的为阵亡将士所作的葬礼悼词中,将雅典与其他城邦(例如,具军事专制社会结构的斯巴达)的区别特征进行了描述,在此他描述的就是政治生物社会。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公元前 460/455—前 400/395 年)将这位政治家的悼词记载了下来,悼词中这样写道:“我们是这种观点的唯一拥有者:如果一个公民^④没有国家感,我们不认为他是沉静的人,而认为他是社会无用成员。我们的人民可以自己进行决策,可以自己寻求有利于事物发展的正确方式;我们认

① zoon politikon,本意为城邦生物,即城邦共同体生物。politikon 同 politisch 一样,引自 Polis——城邦,意为共同体的或与之有关的。——译者注。下文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② Lernprozessen,直译是学习进程,学习过程,这是贯穿本书的重要词汇,在本书中主要为思想认识过程。

③ 伯里克利(约公元前 495—前 429 年),古希腊重要政治家。

④ Bürger,此时的公民为拥有如选举权等特定权利、相对自由的阶层。

为,在必须采取某个行动之前,如果你没受过教育,没受过语言训练,那么语言往往是错误的,无助于行动……简而言之,我们雅典总体来说就是希腊教育学院……”¹自亚里士多德起,政治的人(*politischer Mensch*)这个概念的发展,在每个时代都得到了各式各样的努力,这些努力表现在:对这个概念作进一步的定义,赋予它更多的意义,并让它拥有常与个性相关的个体特性。

世人秉性迥异,一些人的秉性绝不可称为政治性,而政治的人与他们的区别又在哪里?经常表现出的一个特征是:政治的人拥有对他人行使权力的能力。对许多人来说权力似乎是其关键特征。马克斯·韦伯这样指出:“对我们来说‘政治’意味着:追求权力拥有,追求对权力分配施加影响……如果我们谈到一个问题时说:这是政治问题,谈到一位部长或官员时说,这是位政治官员,谈到一个决策时说,这是有政治条件的,这就是说,这些问题都与权力占有、权力巩固、权力转移意向有关;反之,权力占有、权力巩固、权力转移意向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并决定有关官员的工作领域。——谁搞政治,谁就追逐权力。”²在实现权力欲望的角逐场上,“政治活动如同在硬板上缓慢坚韧地打眼儿,既要有激情,又要有明鉴能力”³。因而一个政治家应具有三个决定性素质:对事业的激情、责任感和明鉴力。⁴

然而,如果政治与政治活跃人士,果真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紧密结合在权力与国家这个范畴系统中,使政治成为自成体系的特殊领域的话,这样的政治专业化进程,恰恰会通过它自行其是、分工不同的部门,窒息政治生物的呼吸,清除其生活土壤,而这空气与土壤正是亚里士多德讲述政治生物时提到的社会福祉的内容所在。

即使以其人类消极主义^①著称并著有成功之伦理学的马基雅维利^②,也认为政治的人是一个与权力、统治镶嵌在一起的概念。按照他的说法,一个人政权上的成功取决于三大要素,它们是:*necessità*, *virtù* 和 *fortuna*。第一是 *necessità*,即事业具必然性,不可避免性,影响现实的因素须由具审时度势能力的人认清。第二,*virtù*,即美德,这点较复杂,马基雅维利提到的美德即政治凝聚力的源泉所在。提到此概念时,他将之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一般意义上具政治能量的美德,它可以是某种政治“原材料”;另一种是具体的历史塑造力,雅典共和制、罗马共和国、(1806年前的)德意志帝国直辖市及瑞士行政州的形成都要归功于由它产生的政治酵素。⁵最后一个决定要素 *fortuna*,是命运或者说机遇,它可以是有利的,也可以是不利的。“如果我们尚未失去……意愿自由,也许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努力能否成功,一半

① *Pessimismus*, 消极主义,又译悲观主义。

②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 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哲学家。

取决于命运,而另一半或另一小半取决于我们的自由意志。”⁶不过对机遇,对出现的各种阻碍势力,马基雅维利并未将之理解为任何政治努力也奈何不得的。他将机遇比作洪水,当洪水汹涌前来,首先会摧毁的是那些没有任何如水坝、运河这样的防范措施的土地。马基雅维利指出:“机遇的情况也类似,洪水会在不受阻拦的地方乘虚而入,会在没有大坝、河堤的地方横行霸道、耀武扬威。……我以为,一个政治家,只有他的行政方式符合时代精神时才会成功;反之只会失败。”⁷

为了对政治生物、政治的人(homo politicus)的特征作简要说明,我在这里引用了一些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但这并不是说我要继续这个思路,要对此概念给出不同时代的不同解释。

本书要做的完全是另外的事情。我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人们会失去他们的政治头脑,而另一些人原本不是政治活动家,却会积极从政,展现他们的政治嗅觉和判断力——有时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我要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这个问题会引出的其他问题是:决定现存政治的关键因素有哪些,是品格、理论知识^①、学习、经历察知(Erfahrung)还是良知?在此我将用事例来说明我的论述。

中士安东·施密德(Anton Schmid)的故事,是每每令我激动不已的事例。这是汉娜·阿伦特《纳粹战犯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②一书中,证人阿巴·考夫纳讲述的故事。二战期间,安东·施密德率领一个巡逻队,在波兰负责寻找散落在各地、同部队失去了联系的德军士兵。搜寻过程中他们遇到了犹太地下组织成员,阿巴·考夫纳就是其中一位。施密德为这些犹太游击队队员办理假护照,并用军车把他们送到安全地带。给获救的犹太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对此他分文不取。这个行动从1941年10月至1942年3月持续了五个多月,直到安东·施密德被捕,遭到处决。汉娜·阿伦特视之为一个典范事例:犹太人得到的帮助不仅来自犹太人,也来自非犹太人。阿巴·考夫纳讲述安东·施密德故事的几分钟内,法庭大厅出现了奇异的沉默。这同样是向安东·施密德致敬的几分钟。没有谁可以解释,这个男人作出如此举措的动力来源;没有谁知道,他所以这样铤而走险,是因为他良心发现,因为他的政治判断力,还是因为他对残忍有憎恶认知。他不单思考,而且身体力行,将思想付诸行动;在此他一定知道,他这样帮助犹太游击队队员,已经站到了纳粹权力当局意识中的“敌人”一边,为此他

① Wissen,知识,本书中主要指社会学、哲学等认识理论。

② 又译为“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犹太人,德裔美国政治理论家。

将必死无疑。

通过这个事例,汉娜·阿伦特得出两个重要推论,它们在我的研究中也显示出了其基本性,其一是要不断抵制遗忘,它是人性及政治性存在的基石,另一个要对社会整体睁大眼睛,我们在这个整体中结合在一起,并有义务为之采取行动。这两点也属于承载人性内容的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任何单纯正确的操行都不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谁认为,抵抗纳粹的不过是安东·施密德一个人,或者顶多有几千人进行了抵抗,而参与其中的是大多数的话,那他已经在同样的压制机制与遗忘机制中工作了。遗忘也正是纳粹灭亡前要做的事,他们想擦掉一切血迹,就像普通刑事犯总试图销赃灭迹、掩盖罪行一样。汉娜·阿伦特指出:“不错,极权专制总希望让所有行径,无论善恶,都消失在遗忘中。可纵然纳粹统治从1942年6月开始,进行了怎样大规模的清除大屠杀痕迹的工作——或以火葬,或以露天土坑焚烧,或通过爆炸,或用火焰喷射器烧毁,或用骨粉机将白骨碾碎——这场灭迹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他们想让对手在匿名中无声无息消失掉的努力,也一样徒劳无功。没有哪个暗道能如此之深,可销毁掉所有痕迹,人类做不出如此完美之事;反之世界上还有太多的人,要终止遗忘。将故事讲下去的人永远会出现。因而,没有什么会是‘毫无用处’,至少不会永远如此。如果能讲出更多这类故事(强调为作者奥斯卡·内格特所加),对当今德国会具有巨大实用价值,这不仅关系到德国在国外的声誉,还有助于实现内部力量平衡。因为这类故事的道理如此简单,每个人都能理解。这个道理从政治上讲就是,大多数人会屈从于专政强制,但有些人不会。比如那些从不(对犹太人)作出‘灭绝’(Endlösung)决定的国家,人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这等‘灭绝’事情在大多数国家都‘可能发生’,但并不能到处发生。就人类而言,为使地球作为人类居住地继续存在,并不需要额外的什么,也不能被理智地额外要求什么。”⁹

政治教育要做的,只是要将一些要求变得稍微多一些;这多一些的要求就是,正如汉娜·阿伦特以深深的人道克制强调的,不要去要求。

那些年,当许多人可能只能以愤怒、难过、梦想度过漫长岁月之时,格奥尔格·埃尔瑟(Georg Elser, 1903—1945)成了要将其意愿付诸行动的少数人之一。他是暗杀希特勒的最神秘的刺客之一。1933年前希特勒受到过24次暗杀,但暗杀都没有成功。格奥尔格·埃尔瑟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详尽,这更为他不明不白的失败罩上了一层神秘,还使这次暗杀比起后来在东普鲁士临时军营中对希特勒的暗杀还要迷雾重重。

对于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动机促使某人单凭自己的思虑、经历察知、激情,便

采取抵抗行动,肯定会有非常不同的答案。显然,只凭察觉到了什么或受过一定教育都远不足够,良心谴责只能埋藏在内心,只能促使自己做策略上的等待。像1944年7月20日发生的施陶芬贝格^①刺杀事件,这是由多人协商准备下,有组织、有计划的抵抗行动,对这样的行动,人们不难对其动机给出解释。这些军官,最近在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就认清了德国不会打赢战争的现实。其实这点不仅施陶芬贝格和他的战友知道,许多其他高级军官也都知道。同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后,纳粹德国的败局更是显而易见。但这并不能说,他们的暗杀行动只是出于他们对军事败局的认识,在此,良心的决策力、军人的荣誉感、政治信念,以及宗教背景都一定起了重要作用。

对自发的抵抗行动,解释起来要困难得多。它们没有受到任何特殊影响。24起没有成功的暗杀行动中,有一些其准备和进行过程同格奥尔格·埃尔瑟的类似。格奥尔格·埃尔瑟是施瓦本木匠,为了安装上自己手工制造的炸弹,他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度过了三十多个夜晚。他知道,1939年11月8日希特勒要来参加一年一度对1923年啤酒馆政变的传统纪念活动。他计划在那天炸死希特勒。我讲述一些埃尔瑟的生活片段,是想让我们对这种抵抗行动更容易理解些。¹⁰

如我们所知,暗杀行动按计划进行得很顺利,炸弹准时在21:20时爆炸——希特勒并无预感,却提早10分钟离开了啤酒馆。埃尔瑟不是自杀式袭击者,事发后他想逃到瑞士,继续做他的木匠,不幸在边境被捕。他身上带有制造炸弹的残余材料,让人很快作出他是“凶犯”的判断。

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埃尔瑟冒这样大的风险,精心策划这样的暗杀?他用了一年多时间,勘察场地,收集炸弹制造材料。据说,他不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只是共产党的支持者。他是木工工会成员,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积极的表现。他加入“红色阵线联盟”,还是因为同事的劝说。根据了解到的资料,埃尔瑟也从不会认为自己是什么狂热分子——只有当他感到自己的工匠荣誉受到伤害时,才能让人感到他强烈的公正意识,感到他的火爆热忱。毫无疑问,他技艺高超,一切做得天衣无缝,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以至于没有人怀疑到他头上。

当然在同工人同事的谈论中,他能感到民众不断增长的对自身社会处境的不满情绪,但要计划并实施对希特勒的刺杀,单以此点为动机还远远不够。他所以决定刺杀希特勒,关键因素在于,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希特勒及他的同僚定会 will 将德国引向战争。其实1925年前后德国已经出现了“为希特勒投票,就是为战争投

^① 施陶芬贝格(Stauffenberg, 1907—1944),德国纳粹陆军上校。

票”的标语。1938 年出现苏台德区紧张局势^①期间,叫战的喧闹声越来越响,一定是这个原因促使埃尔瑟作出决定,要刺杀希特勒,阻止战争。一年之后当埃尔瑟实施他的刺杀计划时,他所担心的战争已经成为事实,此时他所希望的只能是,要结束战争。

但不论是埃尔瑟的努力,还是 1944 年 7 月 20 日那些军官男女们的行动,均以失败告终。然而他们为重建人类尊严,为证实公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令人瞩目的一章。被捕后,约翰·格奥尔格·埃尔瑟被监禁在达豪集中营,几年之后他同迪特里希·潘霍华^②及尤斯图斯·比雷尔斯^③,于 1945 年 4 月 9 日同一天被执行死刑。然而像格奥尔格·埃尔瑟这样的人,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被归到抵抗运动参与者中,获得了应有的荣誉和地位。在那些黑暗年月,正是这些“寻常人”挺身而出,为捍卫最低限度的人类文明而战,给人们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虽然只有少数人能鼓起这种勇气,但这个少数仍能给人以激励鼓舞。埃尔瑟不过是一个木工,却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之间的必然联系,而这种关联在当时全国上下许多特权阶层、军界人物、学术精英中都未被认识到。

中士安东·施密德和木工格奥尔格·埃尔瑟的故事,为我们在抵抗遭受破坏的极端社会中树立了榜样。汉娜·阿伦特非常赞赏这种“寻常人”的抵抗行为,她希望并梦想,这样的故事(不一定要以生命为代价)越多越好,他们是对人类生活有别样视角的典范,与只以业绩为导向的政权追随者大相径庭。

千千万万这样的追随者也会造成“寻常社会环境”,开始时没有一丝迹象能表明,这种寻常社会将以灾难告终。如今要对此“寻常社会”进行检验的要求日渐退化,而这正是今日不同教育体系——不论大、中、小学,还是职业教育学校——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任务。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就是让人能在寻常环境中找出能给社会群体带来不幸的政治决策。不要等到社会风气败坏,不要等到统治精英层道德变态,造就出正直努力和行使政治判断力变得越来越困难,并往往徒劳无功的社会环境。——这些就是我的研究兴趣及目的所在。我认为,那些出现在极端压力下,比如在极权体制下的抗争活动,在寻常社会环境中都能找到它们的前身。

政治干预必须最晚在什么时候,并在怎样的条件下实施,才可以阻断会导致社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捷克斯洛伐克与纳粹德国之间的一次冲突。起因是对苏台德地区的主权争议。

② 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德国神学家,刺杀希特勒未果。

③ 尤斯图斯·比雷尔斯(Justus Perels),反对纳粹的德国法学家。

会灾难及集体不幸的发展？这也是克里斯塔·沃尔夫^①的小说《卡珊德拉》中的问题。她在小说中写道：“人人知道战争开始的日期，可战前期从何时开始？如果有什么规则，一定要传播开来，要留下声音，刻在石头里，流传下去。那里应写什么？那里应有这样一句：你们不要被自己蒙骗。”¹¹要对战前复杂的社会政治格局作出正确评估，需建立可对社会进行审查质疑的分析系统，用以及时跟踪各个现实层面（Wirklichkeitsschichten）的发展，揭示也可能会在官方体制下存在的现实政治潜势。

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对现实裂变（Wirklichkeitsspaltung）进程的理解。其一是魏玛共和国堕为纳粹社会的历史；第二个例子尽管更早些，却具绝好典型意义，那就是古罗马具权威地位的元老院的瓦解崩溃，共和制由此过渡为元首制。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②在他对当代历史的回忆录中，记载了1914至1933年间，他对一些日常变化的惊愕。他不能理解，一些不久前还在社会交往中具完整审视判断能力的人，何以突然之间不可思议地改变了他们的语言方式，改变了他们喜欢张贴的图画，改变了热衷所在。哈夫纳在他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1914—1933年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第三帝国诞生史，是个悬而未决的大谜团。在我看来，它要比‘国会大厦之火由谁点燃’还有意思。这里的问题是：德国人都哪儿去了？1933年3月5日，他们中绝大多数没有投希特勒的赞成票，这些大多数都做了什么？都死了？从地球上消失了？或者最后都成了纳粹？他们那个能让人注意到的态度怎么不见了？几乎所有我的读者以前都会认识一两个德国人，大多数人会认为，他们跟其他人一样寻常、友好、有教养——当然也可能有些民族主义情绪。如今，我的读者听着那些响彻全德国的讲话，意识到每天发生在德国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到他们的德国熟人，会瞠目结舌地发问：他们现在怎样？他们也真是那个疯人院里的疯子吗？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吗？意识不到以他们的名义出了什么事情吗？他们情愿这一切发生吗？他们算什么人？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们？”¹²

判断力是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联系的纽带。察觉力与感觉能力是比较特殊的東西。当你把视线投到大街上，你察觉到、感觉到可能有人正在受酷刑、被羞辱，你

① 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1929—2011），德国著名女作家。

②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1907—1999），德国历史作家。1938年逃到英国，1954年回德国。

会把看到和感到的同这个社会联系起来,感到他们所受的酷刑、羞辱是这个社会允许的,这些就是你具有判断力的标志。如果警察对此等残害坐视不管,那么每个有判断力的人都会向放任自流的有关政府部门提出指责。可为什么有人视而不见?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给出了他的数据:1933年3月5日国民议会选举时,尽管纳粹党以武力相威胁,仍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投纳粹的赞成票。选举结果,647名国会议员中,纳粹——民族社会主义^①党成员占288名。紧接着,81名共产党议员在国民议会中受到排斥,被殴打,甚至遭逮捕谋杀。截至这年6月,那大多数人都哪儿去了?他们不可能都疯了,就算集体歇斯底里,也不可能把他们都推往一个方向,唯一可能的是:他们的政治判断力早就受到了破坏。¹³哈夫纳问道:那么,决定性的变化是从何开始的?是通过什么开始的呢?

事实上,这些问题已涉及性格形成的研究领域:这样的个性是怎样形成的,以致灭绝与虐待行径可畅通无阻,而这样的社会状况还得到了最高当局的许可。而且此时私人与公众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奇特变化:具判断力的公民,本来对纳粹明目张胆的残酷性十分了解,也会在私下对它的蔓延进行批评,而渐渐地,他们竟也会为“德国的新生”欢欣鼓舞。对此等事实只能作这样的解释:在现实社会面前,人们对自己决定性的仲裁机构(Instanz)——判断力,感到了深深绝望。

也许很有必要以一个全新方式来论述经历察知(Erfahrung)与判断。前往投票大厅投票前,人们已表达了自己的投票意向,他们在窗外挂出了旗子,他们已经向党领导报以热烈鼓掌,在自己家里挂出的画像,正是他们要选的人。这就是说,公开选举前他们已私下作出决定,尽管——如塞巴斯蒂安·哈夫纳所述——对立党派贴出的“希特勒就是战争”的广告牌仍然可见。很有可能他们耳边还响着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工会代表的发言,但他们的判断力仍未强大到对纳粹采取抵抗态度。于是汉娜·阿伦特所描述的“最伤心的事”出现了: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要做什么,最终也做了;可我们的朋友做的,我们只有通过某种苦涩来获知。

社会大动荡时期人人面临两种对现实的选择,使独立判断力受到最严峻的考验。在这个时期,许多精力必须用在为自己的决定保持平衡上,在此,对政治舆论的判断力便太多地被减弱消除了。以上是我举出的近代历史的例子。面对两种抉择,当人们不知哪一种可持久发展,可又必须作出一种选择时,内心的恐惧会消耗大量生命能量。这时最可对心灵施加压力的当前局势便会占上风,成为赢家,因为相比之下,未来只是模糊不清的影子,对当前现实的影响不大。

^① Nationalsozialismus, 旧译国家社会主义。

另一个历史事件也许是关于现实裂变的第二个绝好例证,尽管它发生在距今两千年前的罗马,通过它可以使我们看到预先进行解明^①和政治教育之意义重大。如我们所知,罗马人在许多方面都显示出他们的政治天赋,他们创建了各种机构,在政治运作方面堪称楷模。

罗马时期,罗马共和国元老院为世界统治中心。当时无一人敢以闲谈方式决策战争与和平这样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元老院的所有成员都受过演说术^②教育(在古希腊时期,演说家就相当于政治家),然而,这个雄辩的统治世界却不肯让自己的政治言行和决定接受任何检查,不能让真正的权力关系受到考核。因而所有政治决定不能在这个中心作出,而是在外面;不仅如此,这些决定最终动摇了整个共和国机制。最后,本应作出政治决策的元老院,演说能力变得一文不值,一切大权落入大将军庞培和恺撒手中。从共和制到元首制^③的巨变中,形成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现实局势,出现了现实层的分化。

著名的古代世界史学者克里斯蒂安·迈耶^④,对罗马共和国的覆没进行了精细研究,他认为这里出现的是涂尔干^⑤指出的失范状态^⑥,即社会道德的真空态。在此,自古以来制定规章的机构^⑦和美德均名誉扫地,不再被认为应该得到照搬使用,而新的合法执政者尚未出现。迈耶以对历史的细腻敏感描述了这一现实裂变(当然也考虑到了当代的社会背景)。

这里将希特勒同恺撒、庞培作比较或类比的嫌疑,几乎难以排除。这是一个社会进程,对“不再”与“尚未”之间危机四伏的世界,意义重大。克里斯蒂安·迈耶在他的《恺撒》一书中指出:“要将‘不再’与‘尚未’区分开来,本身就是要作历史判别的问题,并且它具有双重意义:我们不光更聪明,因为与同时代人不同的是:我们知道出路,而且还拥有另外的思维体系——因我们学会了历史性思考。从历史角度来说,每个社会状态都是一个过渡阶段,在社会体系中处于双重危机状态。即便在个别情况下会出现混淆情况,但在当今社会,希望对‘不再’与‘尚未’作出区别的愿望空前高涨。这种情况在古代几乎不可想象,在罗马共和国更不可提及。

① Aufklärung,又译启蒙。

② Rhetorik,又译修辞学。

③ 公元前27年屋大维成为实质上的第一位罗马帝国皇帝,元首制由屋大维建立。

④ 克里斯蒂安·迈耶(Christian Meier,1929—),德国学者。

⑤ 涂尔干(Durkheim,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

⑥ Die anomische Zustand,由涂尔干提出的社会学术语,指动荡社会出现的传统价值及其社会规范受到削弱、破坏、瓦解,导致社会成员心理上出现的无序状态。

⑦ Institutionen,社会学术语,指家庭、学校、医院、法院、行政机构、组织等。

那时候,传统仍被当作是通用、持久、坚固的正统准则,即使它会一时莫名其妙地软弱无能。就算西塞罗^①抱怨‘共和国已经没落’(res publica amissa est),这也并不是说共和国已经灭亡,而是要说,它不过一时不存在了而已。它还可以被再找到,再次行使全部机能。绝望时——那时他刚满 55 岁——他也担心,庞培及其盟友超常的权力优势,不会在他生命期间得到削弱。而他 51 岁时,还绝不能想象,老共和国不会再光复崛起了。”¹⁴

西塞罗对“共和国没落”(res publica amissa)¹⁵的悲叹,显示了他对社会秩序不坚固性的敏感:表面上各种社会机构都在正常行使职能,可内部却在发酵冒泡,酝酿着矛盾冲突。a-mitare, a-misum(没落)的含义非常丰富,既意味着“离开自身”“发送”“解除”“让离去”,又可以是“有意任其破落”“放弃”“放任自流”。

结合对政治思想教育及政治判断力的思考,当今发展状况我们也完全可以说是个共和国没落状况,即民主体制受疏落,真正的民主越来越少的社会状况。魏玛共和国的灭亡是一个类似民主受疏落的实例。如今我们充满自信、高枕无忧,只关心经济和市场问题,这本身也是对社会关注力松懈的表现。

如果不涉及政治体系问题,政治教育不可能成功。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体制下?起决定作用的权力统治关系如何?如果认为这些问题有害于现代化建设,需排除掉的话,那政治教育不过是对现实的再认识。对现实的狭窄视野及片面了解,会造成历史视野的缩小,而扩展历史视野是精确评说当前现实的重要手段,它还可使我们了解现实社会的利益纠葛、矛盾的尖锐程度、体制的运作状态。克里斯蒂安·迈耶同其他较保守的历史学家一样,生动描写历史的时候十分慎重严谨,力求不让模拟落入误导。他走得更远些,认为这种共和国没落的状态可视为静态中的动态,当年该状态持续数百年后,最终诞生了与罗马帝国不可同日而语的君主政体,他将这种状态同他著书时的历史局势作了比较。他的分析富有教益,很有说服力,正如他在该书今年(2010 年)新版前言中所述:“如果一种政治体制受到威胁,原因往往不在外部影响,而在于自身不足,是对自己任务的不适当设置;它似乎没有能力以自身基础发展其他可能。酝酿中的势力满意它的此等现状;不满者,尽管自己困境重重,却不能摆脱单个境况,承担起改革重负。尽管到处有冲突、弊端、贫困、不满,却都被视为‘危机与出路’。这种状况有违于这种基本观点:流传下的被彻底取代前,新的已经来临,或至少已宣告了它们的来临;西方世界在这种观念中一直生活

① 西塞罗(公元前 106—前 43 年),罗马著名演说家、政治家。